



波诡云谲，险象环生，“六龄幼童”何以应对？

扑朔迷离，众说纷纭，历史真相能否还原？

全景扫描，细节刻画，用解密档案告诉您一个真实的中共五大——
中国共产党探索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重要环节。

方 城◎主编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十一五”规划资助课题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方 城◎主编

撰稿 方 城 赵晓琳 周 斌
宋 健 万 琳 王 谦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方城主编.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11.6

ISBN 978 - 7 - 216 - 06844 - 4

I. 烟…

II. 方…

III. 中共五大(1927)—史料

IV. D2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9244 号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方 城 主 编

出版发行: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人民出版社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荆州市翔羚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开本:787 毫米 × 1010 毫米 1/16

印张:13

字数:184 千字

插页:2

版次: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次:201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216 - 06844 - 4

定价:26.00 元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石仲泉

2007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国家文物局和中共湖北省委、中共武汉市委在武汉联合召开“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此前,我因为日程排得很满,人也不在北京,没有写文章与会。具体策划这次研讨会的方城同志两次给我家里打电话,望我无论如何回湖北一趟,参加会议并作主题学术报告。家乡的事要支持,这使我无话可言了。谁要我是湖北游子呢?故乡人这样诚挚邀请,我无法婉拒,只好“临时抱佛脚”赶回,凭着几年前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时的一些想法,以《从党的五大到八七会议——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第一次转折》为题,讲了几点不成熟的意见。

在这之前,武汉市委、市政府新建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举办“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方城同志应邀指导编写陈列大纲。方城同志是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学科带头人,曾独立撰写或与人合作《谁主沉浮——大革命洪流中的毛泽东》、《包惠僧》等专著,主持《中国共产党湖北历史》第一卷、《中国共产党在湖北80年》等课题,并参与《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抽调中央党史研究室工作。他和参与大纲编写的其他同志一道,将中共五大放在中国共产党人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逐步认识国情,推动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的大背景来认识和评价中共五大,得出“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结论,取得了中共五大研究的重大突破。这个大纲经中央党史研究室审查通过,得到了党史学界的高度评价。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按照这个大纲组织的陈列展出以后,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湖北人民出版社去年底约请方城同志撰写一本关于中共五大的全景式纪实作品,作为向党的90周年诞辰的献礼。由于时间紧迫,方城同志邀约当年参与中共五大历史陈列大纲编写和资料征编的几位同志,夜以继日,用两个多月时间完成了这本图文并茂的《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

当年我在“从中共五大到八七会议——纪念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召开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讲,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放在一起研讨极富创意。这个创意就是方城同志提出来的。《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虽然以描述中共五大为主,仍专设《中共在五大后的奋斗》一章,反映中共五大闭幕到八七会议前后的内容,又一次体现了这个创意。我之所以认为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这两个主题放在一起研讨极富创意,是因为“四一二”以后国内政局急剧变化,阶级关系在重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指示既接二连三又前后矛盾,其驻华代表对急剧变化的政局的认识和策略彼此冲突,党内的主张也纷争不一,将这三四个月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党的认识变化联系起来研讨,可以把这段具有转折意义的特殊历史研究得更全面一些,看问题的视角更辩证一些,对五大的历史地位也可能把握得更实事求是一些。过去讲这段转折的历史往往只讲八七会议。八七会议无疑是这段历史转折的主要标志,但孤零零地讲八七会议不容易说清这段历史转折的原委,因为不少引发转折的因素在此前的若干事件中已经有所积累或开始显现。中共五大就是引发后来历史转折的一次重要会议,不少问题可由此得到说明。因此,我非常赞同将这两个重大事件放在一起研讨。在我看来,这

样联系研究,至少有这样几个优点:

一是对当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看得更加清楚。如果说党的指导思想两个趋向在历史发展的平稳时期无所感觉,那么在历史的转折时期则十分凸显。大革命后期,特别是1927年,党的指导思想两个趋向交错发展,并非错误的趋向一直占据统治地位;陈独秀也并非只有错误的指导思想,还有积极的、比较正确的认识或主张。与此相联系,过去对五大一直评价不高,更多的是强调它的消极方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受了路线斗争将党的历史简单化的影响。按照路线斗争史的逻辑,路线错了,一切皆错,用“串糖葫芦”的办法,将几个问题的错误串在一起就是一条线的错误,即整个都错、无一是处。对那些不是错的,或捂住不讲,或颠倒是非、在鸡蛋里挑骨头当做错误来讲;对错的东西更是夸大其词、无限上纲。这样,对党的历史的认识就不符合乃至扭曲了历史真实。

抛弃路线斗争史的“紧箍咒”,客观地看待五大,它既有消极错误的趋向,还有积极正确的趋向。党的五大是在大革命危急时刻召开的。帝国主义势力加紧了对影响他们在华利益的中国革命的干预;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公开背叛革命,血腥屠杀革命人民;川系、奉系等军阀势力也在制造惨案捕杀共产党人。在这样的形势下,全党对召开五大,进而在五大指导下正确认识严峻复杂的局势、从危难中挽救革命寄予厚望。五大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和参与下,一方面对严重的政治军事形势缺乏清醒认识,对国民党武汉政府抱有幻想,对革命前景盲目乐观,继续贯彻与汪精卫集团一切联合、妥协退让、害怕斗争分裂的错误方针,同时在某些问题上又滋长了“左”的思想情绪,没有提出扭转危难局面的有效措施,这是大革命蓬勃发展起来后党的指导思想错误趋向继续的表现;另一方面,相对于党的四大而言,五大在一些重要的革命理论问题和党的建设问题上的认识,又有很大进步。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例如,在政治理论上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一些正确原则,明确了中国革命将是朝着非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前途,还指出南京蒋介石政权“是帝国主义的工具”、号召“工农商学兵一致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的“法西斯的恐怖”统治等。这是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和比较正确的发展趋向的体现,这个趋向特别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十分突出。当时,我们党的党员已发展至近6万人,初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样,五大对于党的组织建设有一些重大举措:一是首次组建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委会的领导集体,明确提出实行“集体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二是比过去更加重视地方各级党组织和基层党支部建设,明确党支部是真正开展工作的基层组织;三是首次增设中央和省级监察委员会作为中央和省级纪检机关;四是在一切非党群众团体中建立“党团”制度,以贯彻党的政策和实施党的影响;五是在党章中增设《与青年团的关系》一章,进一步密切了党与团的关系。这些都具有开创性的“奠基”意义,应当视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正确的趋向。五大的两个发展趋向都对党的历史进程,包括对八七会议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是对共产国际给中共两方面的影响看得更加清楚。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是从党的创立时就确定了的,也是由那个时期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脱离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而作这样那样的设想,是不切实际的,也是没有意义的。别的不说,没有他们供给经费和培养干部,党的生存都很困难,何论革命!仅此,就应当尊重历史。事实上,从中共建党以来,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始终都是既有积极的、正确的,又有消极的、不

正确的两个方面。那时，我们党还是处于婴儿、幼儿时期，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指导，就如同保姆的作用。既然如此，就有照顾得好的时候，也有照顾得不好的时候。在这段历史转折时期，照顾不好的一面更多一些，但最不好的时候还是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过去由于考虑同苏联党的关系，又加上缺乏历史档案资料，我们对这一面不甚了解。近些年来，随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与中国革命关系的档案资料陆续公布出版，这一面的历史真相渐为广大研究者知道，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全面了，这是可喜的。同时，也有一些偏激之论，对这一面的有些问题看得过重（这也是很难避免的）。不可否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错误指导，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消极的、有害的影响，但是我以为，在看到这一面的同时也不要忘了人家还有另一面——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指导，对中国革命产生的积极作用。

比如，1926 年 11 月下旬至 12 月中旬，共产国际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案》，一方面过高地估计了国民党的革命性，将革命发展的希望主要寄托在蒋介石等人身上，对革命阵营内部斗争的尖锐性和蒋介石等人迅速叛变革命的可能性缺乏认识。另一方面又指出帝国主义已采取分化革命阵营的新策略，大资产阶级将不可避免地脱离革命；中国当前民族革命运动的重要内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未来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无产阶级应竭力争取革命的领导权；革命军队是中国革命的极其重要因素，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之一。这两个方面都对党的五大发生了重要影响，也可以说，五大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与此有密切关系。另外共产国际的“五月紧急指示”的作用也是两方面的。一方面，它把挽救革命的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汪精卫集团，依靠武汉政权来进行土地革命，并希望通过吸收工农群众来壮大国民党地方组织，这些无疑是错误的，也是无法实现的；但另一方面，它提出的不进行土地革命就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不能取得革命胜利,并通过农会从下面实际没收土地,以及动员2万共产党员和5万革命工农来组建自己的可靠军队等主张,尽管也有不切实际的地方,却抓住了挽救革命危机的要害,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共产国际这时已不信任陈独秀,也鉴于武汉汪精卫集团愈益向南京蒋介石集团靠拢,随时都有发生反革命政变的可能,在1927年7月上旬,指示中共中央改组领导机关,并要求中国共产党公开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开展土地革命,武装工农。这个指示尽管来得太晚了,但反映了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挽救中国革命的努力。

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和参与,以及他们的驻华代表之间在工农运动、土地革命、军事行动、战略方向、国共关系、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政策等问题上经常存在的严重分歧,极大地影响了中共中央对政局变化的决断和有关方针政策的实施,这些对中国大革命的失败无疑负有极其重大的责任。过去将大革命的失败完全归罪于陈独秀是错误的,但是,我也不赞同将大革命的失败简单地完全归罪于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客观地分析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在大革命后期对中国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对这种两面性不难作出客观的评判。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对中国革命若干积极的、比较正确的指示,不仅对当时的革命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对以后中国革命的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我们要肯定五大和八七会议的积极作用,而之所以有这样的积极作用难道能离开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积极的、比较正确的指导吗?我以为是离不开的。讲错误,他们应负一份责任;论成就,对他们的贡献也不应抹杀。

三是对大革命的结局和发生历史转折的必然也看得更加清楚。纵观中

共五大到八七会议这段急剧变化的历史,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的转变,我以为
是不可避免的,即存在三个“不可避免”。

首先,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不希望大革命失败是良好的愿望。中共
党史书上总结的这样那样挽救革命的正确主张,不少是“事后诸葛亮”,尽管当时有
的同志提出过,但全党没有达到这个认识水平。中共那时才五六岁,是“学龄前儿
童”,怎么能用成年人的标准来苛求小孩子呢?！要求1927年的大革命取得像1949
年的革命那样的胜利,是不符合中国革命发展进程的空想,太乌托邦了。当年的情
况那么复杂,局势变幻急剧,处于幼年的党既不善于识别和对待以各种面目出现的
敌人和同盟者,也不善于纵横捭阖以革命的两手去应对反革命的两手;对于共产国
际和联共(布)的指示既有组织服从的义务,又缺乏辨别某些是非的能力,不能独立
地运用马列主义正确地解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因此,正如
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这个时期的党“是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三个基
本问题上都没有经验的党,是对于中国的历史状况和社会状况、中国革命的特点、
中国革命的规律都懂得不多的党,是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的革命的实
践还没有完整的、统一的了解的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第610页)。因此,在敌强我弱、敌狡我稚的情势下,大革命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党那时对于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各种势力的警惕性高一些,应对的措施多一些,
遭受的损失会小一些,但不可能挽回失败的局面。

其次,共产党人反抗国民党的残暴屠杀,高举武装暴动、土地革命的旗帜是不
可避免的。这是大革命后期以来,党的指导思想的积极的、正确的趋向发展的必然
结果。对于陈独秀和共产国际代表奉行的右倾退让和妥协政策,党内一直有不同
乃至明确反对的意见。比如: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1927年3月,中共上海区委在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就对蒋介石的阴谋活动有所警惕,认为必须拿出向右派进攻的决心,无论任何方面都不能让步,让步就是断送革命,因而作了一些反蒋的准备。

——4月5日《汪陈联合宣言》发表后,党内不少同志对这个右倾宣言十分愤慨,周恩来就表示过:宣言毫无积极意义,如果继续这样“和缓空气”,革命的损失会很大。

——“四一二”政变后,广东的北江、东江和琼崖地区先后爆发农民武装起义,尽管大多数被镇压下去,但中共广东特委发出指示:各地的暴动表面上虽被反革命派镇压摧残,但已给反革命派重大打击,各级党组织必须坚决地鼓动农民起来进行有计划的暴动。

——在中共五大上,瞿秋白等发言批判了陈独秀、彭述之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向大会提出了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分配土地、加强农民斗争。

——在长沙马日事变后,湖南反革命势力日趋嚣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在6月中旬曾策划在湖南组织武装起义,并准备派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去指挥,后因一些人反对而取消。

——面对反革命势力的猖狂进攻,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张太雷撰文指出:不应撤退或解散我们的队伍,而应整顿与巩固队伍,武装农民“上山”,进行有组织的抵抗。中共湖北省委还举行紧急会议,提出了以武汉为中心,发动工农兵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右派反动政权的建议。与此同时,中共湖南省委也提出了“上山”的主张。7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发言指出:农民武装可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

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7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停止了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并发表声明谴责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动行径，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

这样，在汪精卫集团“七一五”公开“分共”和实行大屠杀政策以后，党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发展趋向所积蓄的革命力量，要高举武装起义的旗帜、进行土地革命就是势所必至。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

再次，在土地革命战争初期发生“左”倾错误也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过去长期认为八七会议是滋生“左”倾错误的开端。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联系起来研讨，就可以清楚地看到，“左”倾错误的理论根源，其实在五大就已经存在了。这就是在批判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时出现的“一次革命论”倾向，在革命性质、阶级关系的分析上混淆了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这在共产国际代表的讲话和瞿秋白的发言中已露端倪。大会宣言没有把叛变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虽处于动摇之中而仍然应该尽可能争取的民族资产阶级区分开来，将蒋介石的叛变看做整个民族资产阶级的叛变，因而认为此后的革命统一战线只包括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三个阶级的联盟，确定职工运动的方针是“要极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基于这样的阶级分析，大会进一步认为“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而是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建设的斗争”去了。这就意味着将民族资产阶级也视为革命的对象。五大宣言蕴含的这种反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左”的思想认识，是后来出现“左”倾盲动倾向的最初理论基础。

事实上，中共五大闭幕后不久，在武汉地区就发生了逮捕民族资本家和查封其财产的事件。邓小平回顾党的这段历史时指出：“就是在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时期，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城市工作也有‘左’的错误。比如，那时候武汉有同我们党合作反对蒋介石的国民党左派政府，我们也在哪里举行罢工，提出的经济要求甚至超过了资产阶级所能负担的程度，结果市场凋敝了，损害了革命政权的经济基础。”“民族资产阶级当然是动摇的，但是要利用它的积极的一面，要有团结有斗争。”（《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343 页）

党在五大时还不成熟，因而既有右的错误，这是主要的，同时在某些问题上也有“左”的错误，这在当时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矫枉会过正，反右易出“左”。当时党中央的成员绝大多数很年轻。中央委员会成员 45 人的平均年龄为 30.4 岁，最小的贺昌才 21 岁。中央政治局的 10 位成员，除陈独秀年近 50 岁和谭平山、苏兆征为 40 岁出头外，其他人均在 30 岁上下，有 4 人为二十八九岁。处于这样的年龄段，认识有些过激和情绪化，是可以理解的。

《烟雨莽苍苍——中共五大全景录》正是因为将中共五大和八七会议放在一起研究和表述，所以使人们在读完本书以后，对当年党的指导思想的两个趋向看得更加清楚，对共产国际给中共两方面的影响看得更加清楚，对大革命的局面和发生历史转折的必然也看得更加清楚。不仅如此，本书还设序章《艰难起步》描述一大到四大党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初步探索，设尾章《走向辉煌》描述六大到七大党的继续探索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程，将中共五大放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链条上进行展示，这就使人们对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历史陈列关于“中共五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艰难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的结论，能够信服地予以认同。

本书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就是可读性。一次会议，能够写成这个样子，确实是费了工夫的。可以看出，作者在致力于展示历史过程、揭示历史本质的同时，还在致力于挖掘历史的审美内涵，并且通过文体的创造表现历史的美学特质。所以，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得到的不仅有知识的营养、思想的启迪，还有审美的享受。所谓可读性，也就由此而产生了。我想，这与方城同志是学文学的、曾经创作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是分不开的。

记得1997年，在东莞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编修第一次座谈会上，方城同志在谈到中共历史是什么的时候，就提出大历史中的中共历史、人的有目的的活动的中共历史、作为审美对象的中共历史的观点，主张研究和表述中共历史，要将其放在大历史的背景中，以人的活动为中心，注重对其审美内涵的挖掘和表现，当场得到张静如先生的赞赏。此前此后，他都在努力实践这种主张，并逐步形成自己的风格。本书就具有这样的风格。据说出版社编辑之所以约请方城同志写这本书，就是看上了他的这种风格。

如此全景式详细描述中共五大的作品，似乎还不多见。近年来，中共五大的研究虽有进展，但仍很薄弱。可以预料，本书的出版，将对中共五大乃至整个中共历史的研究发挥应有的作用。

是为序。

2011年3月于北京

（作者系著名中共党史学家、研究员、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现任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研究会会长）



序章 艰难起步 / 1

第一章 高潮与危机

——中共五大的背景 / 16

革命洪流从珠江流域推进到长江流域 / 16

武汉：大革命后期的全国革命中心 / 24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 / 31

二期北伐宣告“西北学说”破产 / 37

第二章 主动与主导

——中共五大的筹备 / 43

蔡和森的建议遭到共产国际否定 / 43

斯大林在莫斯科遥控指挥 / 45

共产国际代表在中国越俎代庖 / 50

全党讨论共产国际决议加紧筹备五大 / 57

最新考证的数据挑战传统说法 / 60

武昌第一小学和汉口黄陂会馆 / 65

第三章 公开与秘密

——中共五大的经过 / 72

史无前例：嘉宾云集的大会开幕式 / 72

身着长衫的陈独秀俨然回到大学讲台 / 77

瞿秋白之问：“第三国际还是第零国际？” / 80

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刚发二十几本就被勒令收回 / 86



烟雨莽苍苍

——中共五大全景录

一唱一和：罗易和汪精卫成了这天大会的主角 / 93

几十位代表发言与九个决议案通过 / 97

遭到严厉批评的陈独秀依然当选中央总书记 / 103

第四章 贡献与局限

——中共五大的成果 / 109

激烈碰撞：君子动口不动手 / 109

后来的中共五大书记有四位在五大进入中央 / 114

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一把指向自己的利剑 / 117

挽救大革命：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 122

六龄幼童：谁能借我一双慧眼？ / 127

第五章 应变与转折

——中共在五大后的奋斗 / 131

“五人临时中央”上台与陈独秀离职 / 131

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公开“分共” / 137

周恩来匆匆赶到南昌领导武装起义 / 144

鲍罗廷和瞿秋白上庐山“避暑” / 150

8月7日：决定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命运的紧急会议 / 156

武装起义——毛泽东率部走上井冈山 / 161

尾 章 走向辉煌 / 168

主要参考书目 / 183

后 记 / 186

序 章

艰难起步

公元 1921 年 7 月下旬。上海法租界望志路 106 号，一座普通的石库门房子。好几个晚上，13 名黄皮肤中国人和 2 名黄头发外国人围坐在一张餐桌旁，商讨一件事情。几天以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转到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继续商讨，完成了这件事。整个过程隐秘平静，除在上海惹来几名法国巡捕骚扰以外，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后来人们才知道，他们干的是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这就是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中共一大会址

